

# 那根线

邹贤中

2012年,在生意场上沉浮半年的我,终于在那个秋天选择将店铺关门。小店每月入不敷出,如果再撑下去,连吃饭都成问题。倒闭,是迫不得已的选择。

小店关门后,我算了一笔账,当兵多年的退伍费全在生意场上打了水漂。想起做生意前父亲的劝告,我却执意踏入商海,最终惨败,一种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情绪涌上心头。一味沉浸在失败中也不是办法,人要吃饭,要生存,万般无奈之下,我选择到一家小工厂落脚。宿舍无人的时候,夜半辗转反侧的时候,我独自舔着伤口。秋风渐浓,随后冬风来了,很快就临近年关。

知道我经商失败后,父亲也多次打来电话安慰我,特别是年前,多次来电叫我回家过年。想起父亲之前的劝告和自己的惨败,我难免觉得近乡情更怯。那个年,我独自在深圳过的。过年那天,父亲又打来电话,听着电话里热闹的鞭炮声,我愈发孤独。父亲问我:“还记得小时候放风筝的情景吗?”父亲怎么说到了小时候?而且还提到了放风筝?我不明所以。

放下电话,我细细品味,才在记忆的长河中将一些碎片打捞起来,拼凑成儿时的一些画面。那是一个赶集日,我看到有人在卖风筝,就央求父亲买了一只五彩斑斓的蝴蝶风筝。阳光明媚的三月,父亲带我去放风筝。在一块绿茵似锦的草地上,我拿着风筝的提线,逆风向前奔跑,一边跑一边观察风筝飞升的状况,风力强劲,风筝不断向上爬升,我停下来,慢慢放线。而当风力不继时,我则快速向后收线,给予人工的加风。

风筝已经稳稳地升在空中了。父亲走了过来,对我表示赞许。我指着风筝线对父亲说:“这根线束缚了风筝,要是没有这根线,没准风筝可以飞到天涯海角去。”父亲摇了摇头:“没有线的风筝是飞不远的。”我不信,父亲说:“你看。”只见他剪断了我手上的那根线。果不其然,没有了线的牵引,在风力的作用下,风筝迅速飘远,只是时间不长,很快就一头栽了下来。

昔年的往事经过父亲一提醒,又历历在目了。游子是风筝,而家就是拽住风筝的那根线,难道父亲怕我成为那只断了线的风筝吗?我开始为自己的任性感到后悔。没想到的是,在年后的三月,父亲来到了深圳。从千里之外的老家来到深圳的父亲,竟然带来了一只色彩斑斓的风筝。我明白了父亲的心思。一个周末,在莲花山公园恣意汪洋的绿草地上,已经长大成人的我又和父亲放起了风筝。风筝越飞越高,我紧紧地拽住那根线,生怕风筝在短暂地远走高飞后一头栽倒在大地之上。

放完风筝后,父亲没有跟我讲大道理,一些事情和道理我也心知肚明。后来的我,不管工作和生活多么不如意,都会第一时间给家人报平安。我知道,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人,生怕风筝挣脱了线的束缚,从而走上歧途。

## 代父亲交党费

刘先卫

父亲庄严地将一本新党员手册和党费款递给我,叮嘱我到镇党委组织办去交纳党费。端午小长假后上班第一天,我代父亲交纳了全年12个月党费156元,收费人员收好现金,郑重其事地在党员手册上作好记录,并盖上了镇组织委员会的大红印章,我如释重负算是完成了一项光荣而又特别的任务。

今年已有82岁高龄的父亲,是一位有着数十年党龄的老党员。翻开父亲的党员手册,可以详细了解父亲的基本情况:父亲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进入粮食部门工作,1959年反右倾运动扩大化受到错误处理,1982年落实政策复职在人民公社先后担任秘书、会计,组织委员,198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曾在右倾运动中遭受冤屈的父亲,为了恢复工作历经漫长的等待,1982年与舅父一道风尘仆仆赶去长沙,见到了时任湖南省委书记毛致用。书记一纸“按政策落实”的亲笔批示终于使父亲得以平反昭雪。此后,父亲再没有向组织提出过生活和工作上的要求,尽管五个子女解决城镇户口后又全部失业。

我代父亲交纳党费,这是因为父亲1999年退休后,叶落归根从镇上回到了山区老家。老家离镇政府虽然只有十五华里地,若没按时坐上农村公交车就要租乘摩托车,父亲年老体迈行动迟缓,参加行政支部党组织生活也是力不从心,所以老人的安全问题是全家最大的担心,我们也会再三嘱咐老人家不要独自上街购物和领取工资。2017年年底,父亲患前列腺癌在医院做了一次麻醉手术后,记忆力大不如前,交党费的差使自然被我应承了下来。

先前那本旧党员手册陪伴父亲已有三十年之久,一个胶壳本包装的袖珍小册子如今变成了暗红色,小册子随着历年党费交纳完成使命被父亲上锁保管起来。今年初,在父亲一而三再而三的催促下,我从镇组织委员手中领取了一本新册子。鲜红的新党员手册印着镰刀,封面下方有“中共衡阳市委组织部制”字样,内页目录分为入党誓词、中国共产党章程、三会一课制度、支部主题党日制度、交纳党费说明、党费交纳记录等。册子还收录了2017年10月24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修改过的党章内容。

对党一直心怀感恩的父亲,辛勤工作四十余年,获得过荣誉证书一大堆,也就是一个低收入的无名小公务员而已。虽然,我们家没有谁在政府单位谋份公差,但父亲不徇私情、不图名利的言传身教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,教会了我们兄妹用自律、节俭、博爱和包容去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,过着平淡而又幸福的生活。

“城市英雄”之一

## 今天花价多少

何芬



### 编者按:

《城市英雄》独立成篇又互相关联,分为四个篇章,分别为《今天花价多少》《老板娘》《友谊小船》《窗外》,现分篇刊登。

“今天花价多少?”我将我在花店后面的花房里挑好的一打“戴安娜”,放到收银台。

收银的人把头抬一下,看看我拿的是什么花,然后低头翻台面上的记账本,上面密密麻麻记了当天到店的鲜花的进货价。她查到那一页,抬头说:“今天戴安娜是45块。”

我付账时,一旁正在插花的花艺师放下手中的活计,用那只戴着布手套的手抓住我买的那束粉玫瑰。“要打刺吗?”她动手前不忘问我。得到我“不用”的回答后,她扯出一张透明玻璃纸准备打包。

“等下。”另一个比她年长点的花艺师示意她停下,“上次不是还有那种外文报纸图案的包装纸吗?去拿,用那个外面再包一层就不扎手了。而且配单色花,拿着也好看。”

于是,两个女人窸窸窣窣拆开原包装的白色吸水纸,一层玻璃纸再一层硬包装纸地将玫瑰花束包好,再随手给花束扎上一根麻绳,然后满心欢喜地交到我手里。我临出门时,他们还不忘嘱咐:“玻璃纸里面蓄了点水,你不急着回家的话,还足够保鲜。”

我退出门,一只手拿着我的花,笑着点头感谢,然后,慢慢走路回家。

等红灯时,换了只手拎花,突然有了一种身在云南、像买菜一样买花的错觉。

我没有去过云南。我只在十五六岁时,曾听我最小的姑姑说过她十六七岁时对云南昆明的向往:四季如春,气候宜人,是一座开满鲜花的城市。云南大学是姑姑她那个年代的人心目中的双一流高校。但高考失利,被老师料定“云南大学可以闭着眼睛上”的姑姑只考上了衡阳师专。

我是在姑姑姑父乔迁新居的那个暑假,与姑姑打地铺睡在她新房的木地板上,听姑姑聊起这些的。

记得姑姑姑父乔迁家宴上,爸爸给他们敬酒:“祝贺你们,白手起家,在30岁的时候就有了一套靠近医院、学校,位于市中心的100平米的房子。”爸爸回头看看我妈妈,继续对姑姑姑父说:“我和你嫂嫂30岁的时候,还在两地分居吧……你们啊,比我们要强。”“我们,都还是以哥哥嫂嫂为我们的榜样。”文质彬彬、驾着一副金边眼镜的姑父接过爸爸的话,笑起来脸颊上有两个小窝窝。

回想起敬酒的场景,我问姑姑,你跟姑父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呀?

莫非,你们小时候的事情,你不记得了?姑姑惊讶地睁大眼睛。

小时候?小时候的事情我怎么会不记得?听妈妈说,那时姑姑要去实习,已经参加工作的姑父过来送一块手表,那是我们家人第一次见到姑父。那时姑父来见姑姑,姑姑不是带着我,就是带着我弟弟,要么就是把两个人都带着。

吃的什么、玩的什么,我们都忘记了。只记得姑父为了哄我们,也不知给我们买了多少米老鼠唐老鸭的不干贴。跟姑父玩熟了,我就扒拉着姑父眼睛瞧,问:“唐叔叔,你眼皮上怎么有个红色的点点啊?”姑父一笑,两颊笑出两个小窝窝,他告诉我:“我这是个小灯泡。到了晚上的时候,我的小灯泡就亮起来,不要开灯也可以看书。”

呵呵,后来,我才知道,其实我和弟弟才是姑姑姑父的小电灯泡。

姑姑和姑父大概是改革开放后最先懂得浪漫的那一拨人中的一员。

记得我七八岁时,晴朗的秋冬之际,跟着姑姑外语系的同学去野餐,我把佐餐酒当作汽水喝,喝得歪倒在铺着野餐布的茶树林地。迷

迷糊糊中,瞧见姑姑和同学们往一个啤酒瓶子塞字条。那大概是他们写给十年后的自己的话吧。他们围成一个圈,一起握住那个瓶子,姑姑赶紧抱上醉熏熏的我,让我加入他们的队伍。大家喊着“一二三——”,那个瓶子就被抛到了我看不见的地方去了。

中山北路走私街买20块钱的裙子、路口的冷饮店要两杯冰咖啡坐下来边喝边吹冷气,姑姑带着我出去走的是这种路线。而到了姑父那里,是下班后一辆自行车带着我和弟弟一路溜到三塘,去逛三塘老街的“冒险”。至于姑姑和姑父过年回老家,没有坐到班车,搭上农民的拖拉机晃荡着回家的经历,在他们两个的描述里,都是一种开心的经历。姑姑把一条挡灰的丝巾往头上一系,就被姑父拉上了车。

至于表达爱情的玫瑰,更像是一种仪式。姑父不能免俗,像他们那个年代的人一样,注重这种过年过节的仪式感,一送就是喜欢送一大把。不像我们这一代,看淡年节,更在乎每朵花价多少。

记得我还在读高中时,突然不流行送一大把玫瑰了,流行送一朵玫瑰表示“一心一意”。有次去姑姑家吃饭,我刚进屋就发现家里显眼的地方有一枝玫瑰。我才“啊”出声,然后准备对姑父突然也跟风送一朵玫瑰要发表看法,系着围裙的姑姑听到声音,从厨房里钻出来,先于我拿到那枝玫瑰,然后,再炫耀地递给我,要我闻闻它的香味。我一边闻,眼睛却一边滴溜溜地望向正和表弟在饭桌前临毛笔字帖的姑父。

此时,听到姑父幽幽地说:“如晚报所报道的一样,今年情人节玫瑰价格太离谱。我的荷包太瘪,只能买一朵,聊表心意。”

姑姑与姑父结婚后,与我们同城而居,有事联系,无事各忙各的。时间一晃,我都成了别人嘴里的“姑姑”,姑姑姑父成了我女儿最年轻的“姑奶奶”“姑爷爷”。在我与自己喜欢的人微信分享位置,玩着在公共汽车上偶遇、然后一起去吃饭的游戏的时候,他大概不知道,这个游戏,来自二十多年前姑父和姑姑两个人的创意。

我读初中时,住在先锋路职工大学对面的6楼。在职工大学门口有个2路车车站。下午妈妈在厨房准备晚餐时,我会到厨房隔着窗户玻璃看一会儿街景。特别是干冷的冬天,看着看着,与先锋路交叉的和平南路上,那些店铺的灯就三三两两地融成一片,勾勒出一条夜市出来。心头,就会暖暖的。有一次,华灯初上,我看到2路车上跳下来一个个子小巧的、穿藏蓝太空夹克的烟花烫的女子。我定睛一看,那不是姑姑吗?正纳闷,看到高高瘦瘦的姑父骑着辆男式自行车从和平南路慢慢游,慢慢游过来,掂着脚停在姑姑身边。姑姑看见了,麻利地跳上自行车后座。姑父把车头正一正,两人就径直朝着衡阳城边上的家去了。

这如行云流水的日常,节奏准确,步骤清晰,配合默契。以至于好几次早晨6点,妈妈也开始提醒我看楼下说,你还睡懒觉,姑父都带着姑姑到楼下等2路车,要过江去江东上班了。

有次,我刚好也起得早,耳中听到妈妈的唠叨,我就趴到窗户一看。人迹稀少的大街上,姑父刚放下姑姑,姑姑刚解下挡风的丝巾,两人正要道别。

我忍不住趴到窗台大喊:“唐叔叔!姑姑!”姑姑听到声音,抬头一看,随即挥舞着头巾,朝向我们。

特别是姑父,长臂轻轻一挥——“你好,嫂嫂。嗨!何芬。”